

翻譯：學術、專業、半專業

劉靖之

「翻譯」這個名詞，在過去半個世紀裡經歷了令人難以想像的變化。在香港，自「九七回歸」起，「翻譯」這個行業的社會地位得到提升，而在1980年代以前，也正由於「翻譯」沒有社會地位，導致從業人員素質不高。在臺灣這個單語社會，翻譯也未成為重要行業。所謂「重要」，是指社會重視的程度，如對醫療、法律、會計、自然科學等專業，從政府到市民都極為重視，因為這些專業對市民的健康和生活影響重大，一旦忽視，則容易惹麻煩、吃悶虧。在中國大陸情況則有所不同。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從事翻譯的人往往是飽學之士，有社會地位的知識份子，如二十世紀初的嚴復、林紓，二十世紀20、30年代的郭沫若、沈雁冰、林語堂、胡適、魯迅、巴金等都是名滿中國的作家。這些人有自己的專業，有的還在好幾種專業領域裡頗有成就，如郭沫若是詩人、歷史學家、翻譯家；胡適既是學者，又是政治家。看來，在中國翻譯家的知名度大，社會地位高，往往是因為他們的文學作品或政治地位，而不完全是由於他們的翻譯專業。從專業角度來看，他們都不是專業翻譯家，而只能算是半專業翻譯家，因為他們另有職業，但這些人的文學翻譯水準是眾所周知的。

專業和半專業翻譯家

那麼哪些人才算是以翻譯為職業的專業翻譯家呢？傅雷、楊憲益、戴乃迪等屬於這一類專業翻譯家。傅雷雖然也寫些有關作

曲家的文章，但這些文章是為讓他的兒子傅聰對他所彈奏的樂曲有著更進一步的理解而作，並非因為他是專業作家或散文家。傅雷曾向朋友訴苦說，他嘗試過創作小說、畫過畫，結果都無法令自己滿意，這有點像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他曾嘗試過寫歌劇，但始終沒當成作曲家。傅雷原先是靠賣地來維持生活的，1949年之後才靠翻譯版稅過日子。雖然他在巴黎所學的是歐洲藝術史，但他將生命全部投入了翻譯，正如篇幅龐大的《傅雷譯文集》所顯示的，可知他是位百分之百的專業翻譯家。楊憲益和戴乃迪的情況不同，他們在英國牛津大學念書的時候相識，進而相戀結婚，至中國定居，在「文革」中慘受折磨。「文革」後曾回英國訪問，之後仍然回北京定居。他們夫婦一直都在北京外文局從事翻譯工作，因此他們倆也是百分之百的專業翻譯家。

楊氏夫婦於1980年代初來港參加香港大學中文系的研討會，自此我們相識。楊憲益對國學和歷史素有研究，家裡藏有大量的古籍、字畫、印章。我們因威士忌酒而成為好朋友，戴乃迪亦好酒好菸，所以每次他們來香港或我去北京，我們都邊喝邊談。1990年代之後，楊氏夫婦因年紀老邁而不再出國，而我每次到北京都會帶「三五」牌香菸和黑牌威士忌去探訪。1999年底戴乃迪去世後，楊氏頗為落寞。他現在與女兒女婿居住，在睡房裡的寫字桌上，擺了一張偌大的戴乃迪畫像，對著楊氏的床，可見楊氏對妻子的愛戀。楊氏曾告訴我，當他和妻子回到中國之後，他可以選擇在大學裡教書，但他卻選擇去外文局當翻譯，因為做翻譯可以與戴乃迪朝夕相對，教書就不能常常在一起了。這對夫婦把中國的古典文學、歷史、哲學翻譯成英文，包括《離騷》、《詩經》、《史記》、《漢書》、《莊子》、《牡丹亭》、《儒林外史》、《紅樓夢》、漢賦、唐詩，以及魯迅的小說和雜文。不要說翻譯，就算是抄，也夠抄上大半輩子。

我所認識的幾位專業或半專業翻譯家都是十分可敬可愛、極有性格的人，不僅翻譯，做人也值得學習。以下再以英國的四位翻譯家為例，談談他們的翻譯和為人之道。

紐馬克（Peter Newmark）是一位英德翻譯學者。他一直在大學裡教翻譯，教書之餘也從事翻譯。他還是位古典音樂迷，因此我們十分談得來，每次我到倫敦都會乘半小時火車去 Guildford 探訪他；最近一次是 2007 年 10 月，我去倫敦皇家歌劇院看華格納的四部樂劇《指環》，與他相聚了整個下午。

現年 85 歲的紐馬克還在閱讀、寫作、教學，仍然到現在倫敦的特許語言學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nguists）開會。他說每天都要閱讀，還經常寫作，但教學就偶爾爲之了。他的翻譯理論中心內容是將語言的功能分爲抒發、資訊、呼喚，並主張用語義翻譯法來處理語篇用語，用傳意翻譯法來處理資訊和呼喚語篇。紐馬克的「理論」完全是他從德英翻譯實踐中悟出來的心得，而不是爲理論而理論。

另一位是《紅樓夢》的譯者霍克斯（David Hawkes）。原爲牛津大學東方學院中文講座教授，開始翻譯《紅樓夢》之後，覺得自己更適合做翻譯，不太適合當教授，於是辭去講座教授之職，跑到威爾斯山上去潛心翻譯《紅樓夢》。那是 1970 年代的事，英譯《紅樓夢》後由英國企鵝公司出版，直至今日仍然是公認《紅樓夢》最好的英譯本。另一位《紅樓夢》譯者楊憲益也認爲霍譯版是很好的英譯。事實上，霍克斯與楊憲益處於兩種不同的環境，前者愛怎樣翻譯就怎樣翻譯，愛翻多久就翻多久，因爲他是靠教書爲生的，翻譯沒有薪水，要等翻譯完工之後才有版權稿費，換句話說沒有人管；而後者翻譯這部文學巨著是一項任務，既受雇於外文局，就得聽外文局領導的話，趕任務是難以避免的。

譯完《紅樓夢》之後，霍克斯就差不多準備退休了。我是通過霍克斯的女婿閔福德（John Minford）認識霍克斯的，每次去牛津我都會約霍克斯夫婦見面。霍氏夫婦與紐馬克夫婦一樣，不菸不酒，也喜愛古典音樂，因此見面總有話題。2003 年 8 月，我參加蘇格蘭愛丁堡藝術節，去看歌劇、聽音樂會，然後駕車 6、7 小時趕到牛津大學師生最愛去的 Brown's 餐廳，與霍克斯夫婦以及東方學院圖書館館長吃午餐。也是透過

閔福德的关系，我當時主持的嶺南大學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購買了霍克斯翻譯《紅樓夢》所做的筆記手稿，並將這幾本筆記以 facsimile 方式複製出版（*The Story of the Stone: A Translator's Notebooks*，香港嶺南大學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2000）。在「序」裡，閔福德說：「未來的學者會從這本筆記裡體悟翻譯藝術之精髓。」那幾本筆記的原稿現由香港嶺南大學圖書館收藏。此外，閔福德夫婦匯集了一冊由霍克斯的好友所作之文章、書法、繪畫，作為 2003 年霍克斯 80 大壽時的獻禮，書名是 *A Birthday Book for Brother Stone for David Hawkes, at Eighty*（香港翻譯學會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我在這本書裡的文章記述了我聽歐洲古典音樂的經歷，由閔福德出題目——“Notes of A Musical Traveller”（〈音樂旅行者隨筆〉）。

霍克斯因為《紅樓夢》後 40 回非出自曹雪芹之手，翻譯完 80 回之後，就不再翻譯後 40 回，其執著、認真可見一斑。《紅樓夢》的後 40 回後來由閔福德譯出。說到閔福德，他年輕時想當鋼琴家，因父母親的反對而到牛津大學念中文。閔福德富有翻譯才氣，除翻譯了《紅樓夢》的後 40 回，還譯過武俠小說如金庸的《鹿鼎記》，古典文學名著如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他還對我說過他計畫翻譯《易經》，因為這是了解中國文化最重要的一本書。閔福德也有他岳丈的風格，在香港理工大學好好的翻譯講座教授職位，突然辭職不幹，跑到法國南部與西班牙邊界相隔不遠的村莊定居下來，靠種葡萄過日子，業餘做些翻譯補貼家用。2002 年夏季我從巴黎開車到他居住的小村莊去探訪他，一見之下，他們夫婦倆真的變成了法國農民，曬得黑黑的，給人感覺好像全身都有泥土味。只是閔福德的家裡有一架三腳鋼琴，令他還經常作着鋼琴家的夢。

英國的中國科技史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是另一類與翻譯有密切關係的學者。他在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的過程中自始至終都涉及中英翻譯，即把大量的中文科技辭彙譯成英文；各卷之後的附錄又將這些中英對照的辭彙集中在一起，總體觀之便是一部內容極其豐富的《中國科技術語漢英大辭典》。我與李約瑟是 1975 年相識的，那年他來香港大

學接受榮譽理學博士銜。之後我們經常見面，因為他和他的合作者、後來成為妻子的魯桂珍博士常來香港講學、開會，而我常去英國公幹。從倫敦到劍橋只要 90 分鐘的火車車程，每次到劍橋，我都是住在岡維爾基茲學院裡的貴賓房。魯桂珍與我是湖北漢口老鄉，因此我叫她「魯大姐」。李約瑟本來是攻讀醫學外科的，發覺動手術時雙手靈巧比大腦靈活更重要，於是轉行去攻讀生物化學，因為生物化學可以改變人類的基因。在李約瑟的觀念裡，醫學外科沒有生物化學那麼學術。

上述幾位，傅雷、楊憲益、戴乃迪三位是專業翻譯家，霍克斯從半專業到專業，而紐馬克和閔福德在大學教書謀生（後者提前「引退」另當別論），李約瑟在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之餘編譯中英科技辭彙，因此這後三位應該算是半專業翻譯家，對他們來說翻譯只是副業。實際上，專業翻譯家為數極少，反而半專業或業餘翻譯家為數頗多，如上文提到過的嚴復、胡適、林語堂、朱生豪、梁實秋等。香港翻譯學會曾頒發榮譽會士頭銜給香港、臺灣、中國大陸和海外翻譯家，包括閔福德、奈達（Eugene Nida）、張谷若、林文月、余光中、蕭乾、楊絳、戈寶權、黃文範等，這些人都屬於半專業翻譯家。

還有另一種專業翻譯從業人員，如為政府服務的口譯和筆譯人員、商業性質的翻譯社與語言服務公司、香港特區政府所雇請的「中文主任」和「公事語文主任」、跨國公司雇用的翻譯人員等。這些是真正靠翻譯謀生、以翻譯為職業的專業翻譯人員，與上述半專業翻譯家有本質上的差異。在社會功能上，專業翻譯人員所提供的服務直接有惠於社會和市民，而半專業翻譯家在一定程度上以滿足個人對文學與藝術的欣賞與愛好為目的，另一方面也促進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是另一種層次的服務與貢獻。

翻譯與學術

1970年代，英國的大學認為翻譯不是學術，因此對於只有譯著而無論文的講師（即現在的助理教授）在試用期後便不予續聘。現在，幾乎每所大學都設有翻譯系或者翻譯課程，沒有人對翻譯是一門學術科目提出質疑。翻譯的學術價值得到一致肯定。

霍克斯和閔福德雖因他們的譯著而聞名，但準確地說，他們應是漢學家（Sinologists），研究漢文化、歷史的學者。翻譯對他們來說，是一種達到研究漢文化之目的的工具，翻譯本身不是目的，因而他們以學術論文為主，翻譯為輔。傅雷、楊憲益、戴乃迪等這些專業翻譯家則以譯著為主，不寫學術論文，但他們皆因翻譯了經典名著而名滿譯壇。

歐美翻譯發展到現代，出現了為數不少的理論家，包括語文學派的 John Dryden 與 Alexander Tytler；詮釋學派的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George Steiner；目的學派的 Hans J Vermeer、Christiane Nord；文化學派的 James Holmes、Itamar Even-Zohar、Gideon Toury、Jose Lambert、Mary Snell-Hornby、Andre Lefevere、Susan Bassnett 等；和解構學派的 Walter Benjamin、Jacques Derrida、Paul de Man、Lawrence Venuti 等，其他尚有 Eugene Nida 與 Peter Newmark 所代表的語言學派。這些學派的翻譯理論都是中文以外的語文在翻譯實踐過程中所總結出來的經驗，與翻譯批評、翻譯研究有一定的關係，但與漢英、英漢的翻譯實踐和理論研究不一定有直接關係。因此，我們可以去了解歐美的翻譯研究及其各派理論的情況，但更應該發展自己的漢英、英漢翻譯理論與實踐。目前我們的理論工作還處於學習模仿階段。

翻譯與學術之間到底有些什麼關係？上文所提及的翻譯家除了紐馬克之外，其他人對翻譯理論毫無興趣。我們心目中的翻譯大師如傅雷、霍克斯、閔福德、朱生豪、梁實秋等，都是只鍾情於翻譯以及兩種文字之美，而不太理會理論，那麼他們的譯著算不算是學術？那些理論家的論

著毫無疑問都是學術著作，但對翻譯實踐又有什麼幫助和貢獻？我們可不可以把翻譯家看作藝術家，譯著等同再創作，一如音樂演奏者的演繹；把翻譯理論家看作闡釋者，一如音樂學者和他們的論著；或以相同的觀點來看待作家和文學理論家？據我個人的觀察和理解，翻譯理論家擅長於理論，大多數不是出色的翻譯者；同樣的，文學理論家會分析批評文學作品，但不是文學作品的創作者。不過也有例外，有些譯者在他們譯著的序言裡，暢談他們的翻譯心得，裡面便有許多理論材料，提煉出來則是很好的理論，如劉殿爵在《道德經》、《孟子》等英譯本裡的序、霍克斯翻譯《紅樓夢》的筆記、閔福德有關武俠小說英譯的文章等。這些談論心得與體會的序言和文章，較那些純理論更容易為人們所理解、接受。

翻譯批評也屬於學術範疇，與文學批評、音樂批評、美術批評的性質相似，對翻譯理論極為重要，我甚至認為翻譯批評是翻譯理論最可靠的基礎。我常常勸告年輕的博士候選人對翻譯批評狠下功夫，選擇一兩部經典著作及其譯文來進行全方位的分析、研究和批評，從中梳理出一些獨特的現象或啓示。在分析、研究和評論的整個過程中，研究者在欣賞文字之美外，還可獲得大量的訊息和獨特的規律，包括文學、內容和風格等方面，涉及文化、社會、歷史、哲學等背景。

大學的翻譯課程至今已發展成爲一門學術科目，內涵遠遠超過了這個名詞的表面含義。有的大學稱之爲「雙語」(Bilingual) 或「雙文化」(Bicultural) 研究，透過兩種文字深入研究兩種文化，一如一些大學裡的古希臘、古羅馬學科，學生在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字裡得以窺見到當代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可見「雙語研究」或「雙文化研究」是一門龐大的學術科目。由此，從學術的角度來看，翻譯與其他人文學科如歷史、哲學、語文等並無分別，但可能在現代這個日趨全球化的社會略占優勢，因爲它既是一門專業又是一門學術科目，既能服務於社會和國際交流，又能在學術研究上作深入而廣泛的探討。

翻譯 —— 多種事業選擇的媒介

翻譯為人們提供了各種事業選擇的媒介 —— 翻譯系畢業生可以從事翻譯工作，為日益全球化的社會提供橋樑作用，為政府和跨國機構擔任外事工作；可以繼續進修，進行學術研究和譯著評論，從而形成獨特的理論架構；或甚至在翻譯資歷的基礎上邁向其他專業或學術領域，如行政、法律、公關、新聞、編輯、出版、市場等專業領域，以及比較文學、文學評論、政治學、文化學等。翻譯系畢業生應該要在雙語和雙文化上打好基礎，而這種基礎也正是上述各專業、學術領域所需要的。目前無論在中國大陸或臺灣和香港，翻譯系的師生都有一種純技術的傾向，以為只要精通兩國的語文便萬事大吉，這是一種十分狹窄的觀點。在牛津、劍橋、哈佛等大學，攻讀漢語的本科學生最少都一定要在中國大陸或臺灣居住半年，以便讓學生體驗、觀察中國人是如何生活的；足見生活體驗遠比學習語文還要來得重要。

在歐洲，漢學家與翻譯家是兩種不同的行業，前者是學者，後者是專業人員。在美國，「中國觀察家」(China Watcher)與翻譯員也是兩種不同的行業，前者為政府的國際事務和外交服務，後者是專業人員。在中國，我們似乎還沒有分工如此精細的類似行業，但我們有三種不同的翻譯從業人員：一、作家兼翻譯家；二、馬、恩、列、斯著作翻譯員；三、一般翻譯工作者，包括政府、工商業、自由業翻譯員，尤其是1970年代末之後。中國的作家兼翻譯家現象是「五四」以來的優良傳統，現在仍然存在。馬、恩、列、斯著作的翻譯在197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已逐漸式微。而一般翻譯工作者，尤其是科技翻譯人員，在改革開放之後人數迅速增長。在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國際貿易不停擴張的情況下，一般翻譯工作人員的數量還會顯著的增加。國際譯聯(FIT)三年一度的大會將於2008年8月在上海舉行，象徵著中國作為翻譯大國地位的崛起。

結語

上文就翻譯的學術性、專業性、半專業性提出了個人的看法，還向讀者介紹了其所認識的幾位大翻譯家的譯著和性格。我們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一、成功的翻譯家，尤其是文學作品的翻譯家，大多數是多才多藝的，他們不僅對兩種文字敏感，對兩種文化熟悉，在各自領域也卓有所成。從事翻譯一定要學識深厚，常識豐富，見聞廣博。二、翻譯家需要具有藝術家的創作才能和奧林匹克式的毅力，否則就無法完成鴻篇巨制（如《紅樓夢》）的翻譯，也無法將浩瀚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介紹給英語讀者。三、「雙語」與「雙文化」是通往其他專業領域的最佳媒介，也是走向國際的必要工具。

（作者按：本文作者應文藻外語學院翻譯系邀請，於2008年4月27日至5月17日在該系任訪問教授。5月6日在外語學院主持題為〈翻譯：學術、專業、半專業〉之公開講座，本文為講演全文。）

